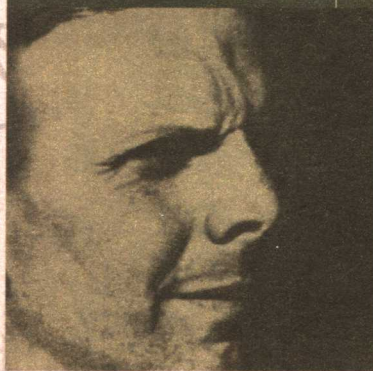


ewissen

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德〕 著

战争亲历者 自叙

丛书



他不断地在战争中认识战争，
终于认清了法西斯主义者发动战争的本质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
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以及其由纳粹军官
到反法西斯主义者转变的
心理历程

Gewissen in Aufruhr

Rudolf Petershagen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李士勋·译

良心在骚动





Gewissen in Aufruhr

Rudolf Petershagen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李士勋·译

良心在骚动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心在骚动/(德)彼得斯哈根著;李士勋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033-1914-3

I. 良… II. ①彼…②李…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386 号

书 名:良心在骚动

作 者: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

译 者:李士勋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程 真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05 千字

印 张:17.625

印 数:1-8000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3-1914-3 / I·1511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1901年出生于德国汉堡，职业军人，1943年，他指挥的格莱夫斯瓦尔德装甲兵九十二团参加了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战役。1945年4月底，德军大势已去，苏联红军兵临城下。时任格莱夫斯瓦尔德城防司令的他为了避免更多无辜者的牺牲和具有五百年历史的大学城在炮火中毁灭，克服重重困难，深夜派出谈判小组，未作任何抵抗便把格莱夫斯瓦尔德交给了苏联红军。交接仪式过后，他被送往苏联后方的俘虏营。在那里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开始思考战后如何清算纳粹意识形态的问题。1948深秋，他被遣返回到格莱夫斯瓦尔德。1951年，他被美国反间谍队逮捕，在美占领区被判处12年监禁，关进慕尼黑附近的兰斯贝格德国第一战犯监狱。后来又被转到德国刑事犯监狱。在西柏林的朋友多方斡旋和格莱夫斯瓦尔德市政委员会和全体市民再三要求下，1955年9月21日被释放。第二次重返格莱夫斯瓦尔德后，他受到该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并被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1957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重印十二次，在当时引起过很大的社会反响。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程 真

前 言

《良心在骚动》是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主要叙述他从1943年至1955年这段时期的切身经历和心路历程。本书1957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出版社出版，共再版过12次，是研究1945年至1955年期间战后和冷战时期德国社会的珍贵资料。1961年，这部回忆录被改编成电视剧。

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职业军人，作家。1901年6月4日生于汉堡，曾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的祖国功勋勋章。

“长期以来，服从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我心里明白：在任何军队里服从都是必要的。我的良心在骚动。”

彼得斯哈根上校是德国纳粹军官中一位不可多得的正直军人。1943年，他指挥的格莱夫斯瓦尔德装甲兵九十二团参加了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战役。由于纳粹内部凌驾于军队之上的党卫队“秘密安全警察”的严密控制，任何反对希特勒疯狂行径的尝试和言论都可能导致杀身之祸并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的罪行还是引起了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上校良心上的不安和抵制。

他这样描写自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负伤后躺在弹坑里的心情：

但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一个界限：根据军事惩罚法典，士兵没有义务遵守一个要求他犯罪的命令。可是，什么是犯罪呢？如果我们现在要问，这一切，即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是不是一个罪行？如果是，那又是什么罪行呢？在清楚地认识到

他那种犯罪的特征时,人们是否还能继续在一起共事?一方面
是这种折磨人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士兵们已经养成并喜欢上的
对义务、荣誉、战友情谊以及对勇敢和经受考验之意志的理解。

那时候,他已经预见到纳粹扬言很快就可以庆祝斯大林格勒陷落的幻想会落空。他亲身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目睹部队和人民的伤亡,使他的内心越来越不安宁,终于使他在关键时刻走上与纳粹彻底决裂的道路。

他在那场战役中腿部受了重伤,5天之后才被送到战地医院抢救。经过一段治疗之后,他被送回格莱夫斯瓦尔德疗养。本来,他可能因此而被提升,但他放弃了那个可能使他的良心陷入更深危机的位置,借故行动不便,留在了地方,成为格莱夫斯瓦尔德的城防司令。1945年4月底,德军大势已去,从苏环节节败退。而苏联红军则势如破竹,已经越过德波奥德-尼斯河边界,兵临城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位城防司令当机立断:为了避免更多无辜者无谓的牺牲,为了使具有500年历史的大学城在炮火中免于毁灭,他克服重重困难,深夜派出谈判小组,未做任何抵抗,把格莱夫斯瓦尔德交给了苏联红军。

交接仪式过后,他被送往苏联后方的俘虏营。在那里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与反法西斯小组很接近,开始思考战后如何清算纳粹意识形态的问题。1948年深秋,他被遣返回格莱夫斯瓦尔德。在苏联占领区,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德国的和平与统一事业而工作。

1951年,他在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冷战中落入美国人策划的一个圈套,被美国反谍队逮捕并由美国占领区法庭判处12年监禁,关进慕尼黑附近的兰茨贝格德国第一战犯监狱。后来又被转到德国刑事犯监狱,被不明不白地关押了4年多。在西柏林的朋友多方斡旋和格莱夫斯瓦尔德市政委员会和全体市民再三要求下,直到1955年9月21日他才被释放。

第二次重返格莱夫斯瓦尔德之后,他受到被拯救的该市人民的热

烈欢迎并被授予市荣誉公民称号。

彼得斯哈根的这部回忆录,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治和军事上鲜为人知的内幕,揭示了当时德国各阶层人的内心世界。他对在兰茨贝格监狱遭遇的描述,更入木三分地记录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冷战的内因。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美国和苏联战后立刻从盟国转变为敌对的两个阵营,纳粹德国的战犯怎样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联邦德国怎样一步步重新武装起来,政府怎样与教会勾结,通过新的立法保证战犯们的优越生活及其高额的养老金。联邦德国监狱里的各种刑事犯也从另一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他留下的另一部著作:长篇小说《生命不是掷骰子游戏》(1962)。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约亨·齐莫尔曼在二战最后几年的命运。约亨是一个手工工人的儿子,性格敏感、轻信,容易受人指使。在纳粹党县长的影响下,他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里的一名积极分子,勇敢而又富于牺牲精神,但却很盲目。错误的信念使他和另一个与他同龄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结成密友。那个朋友曾经参与了一次对故乡民众的屠杀。后来,当县长及其恩人冯·弗里登堡将军在苏联红军大兵压境的紧急关头从波美拉尼亚东部前线退却逃到易北河另一边的时候,约亨·齐莫尔曼却端着冲锋枪向苏联的坦克冲去。通过紧张的故事情节,作者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单纯的、怀着良好信念的德国青年怎样被恶人利用、为罪恶的战争充当炮灰所走过的灾难性道路。

今天重读这部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纳粹德国意识形态的本质,理解和反思那个时代,帮助我们思考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

转折与归来

1

1942年7月底,我们从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里出来,突然看到前面伏尔加河岸边35公里宽的地平线上仿佛海市蜃楼一般出现的巨大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我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了。

陆军元帅鲍鲁斯指挥的第六军团接到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座城市。也就是说,一场歼灭战应该在这个被普遍认为的“泥足巨人^①”脚下展开。

在1942年8月最后的几天里,第六军团的先头部队从几个地方攻入伏尔加河岸边的拖拉机厂。但是,第六军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攻下这座城市,也同样无法阻止新的红军部队和物资运输增援在夜间渡过伏尔加河源源不断地开来。苏联的防守部队越来越强。德国人的损失在与日俱增。当时我指挥的格莱夫斯瓦尔德九十二坦克团的损失也在不断增加。9月初,我的右手受了伤,但是我仍然没下火线。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一个战壕里,师长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善意的计划:“您受伤的手需要静养治疗。您听我说:电台台长汉斯·弗里彻将要到这里来,准备为拿下斯大林格勒在现场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口号是:‘斯大林格勒的陷落。’这一两天就到。为此,还在柏林电台宣布,将授予每个军团一枚骑士十字勋章。关于这件事情我是

^① 指沙皇俄国。

这样想的,您飞回家去,养您的爪子。您终于可以趁机享受一下您应得的假期了。准备弗里彻的到来吧。”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寇勒曼将军的欣喜。他是一个老步兵,他对自己的部下有一颗爱心。“假如斯大林格勒陷落,您就可以在柏林扯开嗓门说话了,回去吧,9月底再飞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新的行动。”他轻松地接着聊下去。

我真的很感激。但是,将军从我的语调里还是听出了我的某种矜持并询问“个中隐情”。我并不想隐瞒,就说道:“将军先生,很可能我要休一个长假了,因为我不相信今后几天就能拿下斯大林格勒。”

“您尽管走好了,那是我们的事。请您尽快离开这里!”他用指挥官的语调诸谑地说道。听到他用这种语调,我就回答道:“遵命,将军先生。”两天之后,我的妻子在格莱夫斯瓦尔德感到意外的惊喜。

2

美丽的秋日过得飞快。军队“捷报频传”,报告着每天的新“战绩”。在高加索山脉最高的山峰埃尔布鲁斯峰上已经插上了卐字旗^①。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却并未实现。

弗里彻的“凯旋之歌”,本来我应该一起唱的,现在也不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戈培尔的号叫,什么“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啦”,“此时此刻,在不幸中才显出英雄本色啦”,“全民都将投入这场战争啦”等等。作为一个老兵,我知道这些话后面掩盖着一种绝望的挣扎。进攻被击退了,但德国领导层里不可能产生出“放弃继续征服”的决心。在戈培尔发表的声明里,这种事实当然是另一种样子。缺乏继续进攻的能力在他那里变成了“最伟大领袖最明智的决定”,现在我们得到的已经足够,愿意首先充分利用一下已经占领的地方。他能够用这种躲躲闪闪把关于征服的宣传转变为保卫已经征服的地区,而许多人对此却

^① 卐(万字不到头)本来是东方文化中象征长久的符号,这里被希特勒反过来使用。

毫无觉察。大多数人听到的仅仅是他们必须理所当然地为“元首和帝国”——牺牲一切——也包括自己最后的生命。戈培尔就是这样从“元首”的危难中杜撰出一种道德并在军事失败外面罩上一个我军正处于优势的光环。这种骤然发生的变化,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得不陷入沉思。

在家乡休假期间,我接待了很多客人并收到很多邀请,这就保证了 I 能够深入了解人们的情绪。有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弗里格·弗尔斯特将军家里做客。他想抓住这个机会谈论一下做装饰用的“复活节兔子”。浪费情况超过了我们在远方的和平习惯。当时我们正处于战争的第三个年头。

穿戴十分讲究的主人摆出一副极其尊贵的架势。这位自觉的将军把第一杯酒献给了“最高战争指挥官和人民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我不由自主地斜眼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带有著名花体字签名的威廉二世的画像。

“本来,我想在斯大林格勒陷落时和你们一起痛饮一瓶”,将军很得意地开始说道,“但是,也许元首想让更多的苏联城市落入我们的圈套。好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了香槟酒;从法国来的,先干一杯!”说着他转动了一下眼珠,当然仅仅在他的“尊严”许可的范围内。

他咂了咂舌头,对我说了声“干杯”。第二杯为了我的健康。我没有说话。相反,他却有失身份地继续说下去:“我又得到了一些东线的消息。俄国人的衣衫破烂不堪,武器也很糟糕。那些士兵被他们的指挥官们用手枪逼着前进。对我们来说,那简直就像我在西里西亚自己的土地上打兔子。”将军的情绪好极了,他一边大笑一边故意炫耀着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那是在轰炸英国南部时立功获得的奖赏,虽然他本人在那场失败的“英国战役”中没有听见一声枪响。

“俄国士兵装备不全、衣衫褴褛,我在远征已开始的时候看见过。”这时候,我接着说道,“一个被俘虏的俄国上校,我请他喝葡萄酒,当时,他对我说:‘我们遭到了突然袭击。谁能想到希特勒那么坏、那么

愚蠢。’虽然我大概能够想象他说的‘坏’指的什么，因为这样的突然袭击和正派的士兵是相矛盾的，在1944年6月22日那天，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感到苦不堪言。但是，他所理解的‘愚蠢’，当时我并不清楚。但现在我更理解他的意思了。”我说到这里，大厅里出现一阵死一般的静寂。将军在他的沙发里动来动去。他的夫人给他一个信号。他站起来，走向电话机，同时大声说道：“元首自有主张！”同时，他用一个沙发靠垫小心翼翼地盖住电话机。我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的惊异唤起了我的兴奋情绪。“我们的敌人也在听着，彼得斯哈根。你还不了解我们的盖世太保吧？”将军现在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放弃了那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更严肃地谈起他的兵种。“我们在英国战役中人员和物资都损失惨重。”然后，他回到盖住电话机的沙发靠垫那里。“真的，把电话机盖住更好些。这里，在我们的故乡，我们有自己的经验！”然后他又讲起他的飞行员中两个年轻军官如何遭难的故事。他们是英国空战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中的两个。其中一个曾经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的步兵’，可惜他没有牺牲。将军以明显的谐谑的口气重复着这种表达方式。另一个军官则更进一步，在一个酒馆里公开地表示：“我们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将会……打赢！”这两个人，就因为他们的那两句话而丢了脑袋。

“是的，那时候，功勋和骑士勋章都不管用了。这种事当然只能想不能说，我扯远了！”那位将军说，他在晚会开始时庄严地为元首的健康干了一杯。也就是说，他把“想”和“说”明确地区别开来了。对他来说，这两个字中间的区别就是把电话机敞着还是盖上。当沙发靠垫盖住电话机的时候，他就摘下了面具。从沙发靠垫下面爬出一位将军，好像他不再相信自己这样做，在盖世太保的耳朵下面是违背自己的良心似的，他对自己的人民和祖国血腥的入侵所取得的成就似乎没有了信心。外面，在所有的前线，每天都有无数勇敢、虔诚的德国士兵在死亡，在家乡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死于冰雹似的炸弹。

这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将军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在当时已成习

惯。所有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尤其是听军队战况的报道:“在可怕的轰炸机的空战中,有14架敌人的轰炸机在帝国西部被击落。我军的损失不大……”这是最后还能听清楚的一句话。其他的报道被一位在场的飞行员遗孀的抗议声压下去了。“我的丈夫被打下来的那一天,战况报道说的和现在说的一模一样。他的死亡不是损失。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打斯大林格勒?我们到底为什么打仗?”

她因为痛苦和绝望而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这种情况很令人难堪,是的,这也是十分痛苦的。我们来到外面,站在大街上,这时候,我长出了一口气。

“真是一个可怕的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前任师长的夫人叹息着说道,“这样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无言以对。

“您认为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吗?”

“我认为我们不可能赢。”

两个女人都像被击中了似的看着我。

“后天,我将回斯大林格勒我的部队去。那里需要我!”

我对自己的回答和对我自己都不满意。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在回避那些折磨着自己的问题,逃往前线,这次去前线是逃跑。

9月底,我飞回斯大林格勒的日子到来了。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心情更加沉重,因为她还没有摆脱我的第一次沉默。面对格莱夫斯瓦尔德九十二团和第六军团全军的未来,她担心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3

我在一个巨大的平原峡谷地带找到了自己的师作战指挥部。由于不断遭到沉重的轰击,指挥部不停地颤抖着,所以我们称之为“颤抖的巴尔卡”。巴尔卡是俄国为这个平原峡谷所起的名称,它是由于洪水长期冲刷而形成的。恶毒的舌头也把“颤抖”两个字与藏在峡谷里的“指挥部”联系起来。

将军坐在地堡里面的一个火炉旁边，脸色苍白，看起来他的精神显然已经崩溃。又看到我，他很高兴。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已经失去了先前所具有的那种朝气和力量。他不停地从耳朵里掏出一个棉球，闻一闻，恶心地摇摇头，说一声“噢，见鬼。”就把它扔进火炉里。将军病了。他患了中耳炎，但他却不想承认。他想咬紧牙关，特别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战士，必须坚持到斯大林格勒陷落。

九十二团为我的归来而兴高采烈。在和平时期，我是这个团的上尉和连长。每一个人都认识我，我们知道大家能够互相信任。在我离开期间，这个团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兵力受到很大损失。士兵们都希望我回来之后能很快扭转这种局势。但是，他们错了，因为导致这种不利形势的原因在于苏联军队的不断增强。因此我也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任何改变。

那是11月初，天气还很好。

可是，转眼之间就变了天，本来一直晴朗的草原一下子就被冰雪覆盖——这种情况将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没有秋天的过渡一下子就进入了冬天。所以，每个人都想办法往更深的地下钻。在这冰天雪地里不得不从地下工事里出来可真是苦不堪言。去年，“将军的冬天”，那时候的教训已经够可怕的了。因为冰冻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炮弹造成的伤亡。我们多么羡慕那些“装备糟糕的俄国兵啊”，他们穿着皮靴和棉衣！

在我离开期间，部队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我访问部队各个单位的时候感觉尤其明显。大多数军官和士兵以前都很信任我，推心置腹，直言不讳。许多军官都是原来我那个连队的士兵。在和平时期，他们都觉得军官的升迁之路被封锁，因为那条道路留给社会上有特权的人了。“当元首挺进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是否听取了正确的建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拿下这样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红军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开始完成的谣言不胫而走。他们在证明自己有权这样做。可是，1942年11月22日，我们被包围了。

当传说我们在西边完成突破的时候，我们部队里的官兵好像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觉得那个传言好像是确实的。鲍鲁斯曾经亲自向希特勒提出突围的建议。但是，希特勒拒绝了。失望是可怕的。在被包围之后，我们不得不掩护着向盆地的北部突围；我们右边的邻居是第三步兵师，他们处在我们团与伏尔加河之间。那边的伏尔加河河段，水流湍急，堤岸陡峭，有令人渴望的葡萄园和西瓜地。相反，我们这一带却只是一片名叫“巴尔卡斯”的不毛之地。很多条比较小的山之余脉，从这个名叫“巴尔卡斯”的地区向两边延伸，像两条臂膀一样在平坦的原野上伸展开来。我们团指挥部设在一个向北延伸的支峡谷里。我们像岸边的燕子一样在坡上垂直向下挖了很多洞穴，因此感觉到自己尽管处在最前线，但却隐蔽得很安全。地面上的火力打不到我们，而重武器的火力从我们头上飞过，落在巨大的巴尔卡斯平原上。我侧着身子躺在小峡谷口，通过望远镜观察着面前展开的平原。我看不到一棵树和一丛灌木，但在荒凉的平原上到处都是能够各自为战的坦克。那钢铁的庞然大物神秘莫测、幽灵般地矗立在地平线上。有几辆坦克还在冒烟。

在我的指挥部里，士兵们紧挨着蹲在那里，他们的谈话声音清晰可闻，如果我不想听，也可以充耳不闻。有人吃惊地说道，这里，在这个“世界的屁眼”里，在这个季节，太阳还能如此温暖地照耀着。副官冯·莱布尼茨中尉在教导他们，斯大林格勒处于布吕恩、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高度上——同时，他的食指在地图的纬度线上画着，“仅仅是为了说出大德意志帝国的几个城市”，正如他强调的那样。他很重视这件事，好像他被看作人道主义的有教养而又虔诚的人似的。其他人都兴趣盎然地看着他的地图。“嗯，现在一切都变得和原来想的不一样了。”报务员说道。冯·莱布尼茨蹙起眉头。他不能忍受那个提醒他的年轻人，可是，他作为报务员又不可缺少。中尉知道报务员刚才暗示的是敌人投下来的传单，首先是第一次从前线对面发射过来的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弗兰茨还活着！我很熟悉他的声音和那种西里西亚方言。”报务员说道。

“我的上帝，他怎么能这样傻，”副官受了刺激，对他说道，“如果他再次背叛祖国，他的舌头将被割掉，您的‘波兰朋友’将永远沉默！无论如何，对老实的德国士兵来说，根本不会成为俄国的俘虏！”（用“英勇自杀”逃避“不光彩的被俘”的豪言壮语，后来也被他自己当成耳旁风。然后，他竟提前做到了，宁可当一个“不光彩的德国兵”也不去死。今天，他是北约的一名军官。）

突然，我看见一辆封闭的坦克上出现一面摇晃着的白旗。所有的人都爬到谷口，挤在我身边。“听我说，前天我就看见他在那里举着一只胳膊！”报务员对他的伙伴说道，“现在，他做了一面白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伤兵绝望的努力，他竭力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帮他。他只能在那里悲惨地死去！”士官若有所思并富有同情心地说道，“如果他是一名俄国兵，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虔诚的中尉说道。说完，他又低头捉身上的虱子去了。毕竟衬衣比外衣更贴近自己的身子。

“这是什么东西？”所有的人都好奇地围过去观看，一个小动物同样被温暖的阳光引诱着从自己的窝里爬了出来。“肯定是一只蝎子或者别的什么有毒的虫子。在这样的地方反正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中尉接着说道。与此同时，他从厚厚的镜片后面观察着那个不知名的东西。

“拿给上校看看去，他会为此而感到高兴的！”

有人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东西送到我面前。

我看了看那只昆虫：“这是一只母螳螂^①！”

所有的人都很感兴趣地跑过来，仔细看着那只在我们的家乡没见过

① 螳螂在德文里原意叫“祈祷虫”。

的一种接近蝗虫的昆虫。

“搔它一下,看它怎样祈祷并且同时把两只手臂抱起来。”有人正确地加以说明。

“真好,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国土上,竟会出现这样一种生物,可惜仅仅是一只动物!”副官尖刻地做着注释。

大家都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最不能容忍这种不切实际的仇恨。我的回答并没有绕过这个问题:

“大家都看到了,许多农民的家里都供着圣像和所祈祷的偶像。应该把村里的教堂给他们留下,不然人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为了保护我的副官的权威,我心平气和地以和解的声调说道。然而,他的脸却红起来,报务员禁不住向我投过理解的目光。

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我们立刻感到冷起来,大家都像接到命令似的立刻穿上外衣。那一次晒太阳成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最后一次日光浴,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突然,冬天降临在平原上,仿佛用一张白色的床单把原野覆盖住了似的,同时也盖住了第六军团。

我忧心忡忡地向将军述职。在噼啪作响的火炉跟前,他的样子显得更加悲惨了。现在,他不停地轮流把左右两边耳朵里掏出来的棉球扔进火里,而且不忘记先闻一闻,恶心地摇摇头,然后诅咒一句。

“好,您来了,我正想和您一起仔细地谈谈师里的形势。”他停顿了片刻,伤感地小声说道,“也许我不得不在这个魔鬼般的城市陷落之前去战地医院。”

毫无疑问:将军考虑的是谁来代表他。我开始推心置腹地说道:“将军先生,您在想什么呀?在这片原野上,既没有树林也没有灌木丛用来遮挡或者取暖。士兵们没有棉衣,他们就蹲在没有炉子的敞着口的地洞里!”我们都不由自主地看着那个噼啪响着的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煮水的容器,水在发出响声,让人感到很舒适。

突然有人敲门,门随即被推开。师部的莱恩维波副官问将军,是否

愿意接见师里的随军牧师。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因为他来这里之前，必须不断地越过散射的火力，一蹿一跳地向前跑。将军不信教，也不喜欢牧师。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我正想起身告辞，将军却极力要我留下。这时候，副官已经把牧师拉进小小的碉堡。我们挤得更紧了些，客人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弹药箱上。我觉得，他最近一段突然老了许多。

他开门见山，用一种痛苦的声音说道：“将军先生，请您把我调回国内吧，我已经快不行了。刚才我在救护站给我们的先锋队指挥官合上了眼睛。他可是我的老朋友当中的最后一个呀！”

将军抓住他的手，默默地表示同情，然后打断了他的话：“我也为我们师团失去这位新指挥官而感到难过，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

“将军先生，还不仅仅如此，我现在马上就 60 岁了，为我们的牺牲者迁葬已经超出我的力量！”说着牧师便伸出双手。我们知道，使牧师崩溃的并不是体力劳动，他有一个专门掘墓的先锋队。

“我再也不知道把尸体往哪里送了，无论老兵还是新兵。一个还没有埋葬完毕，我们的前线就又重新拉直了，也就是说，前锋就又撤回来了。消耗战已经从前面开始。”

恐惧与不安布满了老牧师的面孔。他担负的任务真够可怕的。那些亲爱的老朋友们刚刚最后地安置完毕，稍微往西面撤退就要把他们重新挖出来运走，再重新埋葬，不久又要重复这个过程，日复一日。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大家熟悉的并发症状态下，将军神经质地更换着耳朵中的棉球。他看着碉堡里的一切，在寻求帮助，然后看着我，想起了我们的谈话，接着说道：“此外，我们也应该换岗了！”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这个盆地还没有完全被包围！”不安的声调泄露出他深刻的忧虑和怀疑。

“去年我们就应该安静地休息休息，事情总是没完没了。”我回答道，“可是，假如我们被换了岗，我们的后来者，不论他们是谁，在斯大林格勒这里都同样会面临这种灾难性的问题！事情一定会这样，将军